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孤悬敌后的坚固堡垒

■单宏宇 周一



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的新四军第5师纪念馆。

资料照片

出击,给日伪军造成极大困扰。10月13日拂晓,日伪军出动数百人,从京山县贾店、罗店等地出发,偷袭驻京山县新街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因我军警戒严密,敌军刚出动即被我流动哨兵发现并鸣枪报警。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1团队以第2大队在正面阻击,以第1、第3大队从两侧进攻,三面逼近敌军,将其包围在新街以南黄家台祠堂边的洼地内。战至傍晚,被困日伪军在援军接应下方才逃脱。这是新四军挺进鄂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不仅重创敌人,也树立了军威、提振了武汉周边地区军民的士气,就连国民党报纸也作了突出报道,公开肯定新四军战绩。1939年11月,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边区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随后,挺进纵队南渡汉水,转战侏儒山、京山坪坝等地,打击了武汉周边的日伪力量,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政权。

区分特殊性,建强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策略问题》中指出,游击区是“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最终就转化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鄂豫边区的战斗活动,使当地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同,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但毕竟鄂豫边区地处敌人统治核心地带,斗争形势严峻、斗争烈度较高,客观上形成内部政治格局纷繁复杂的局面。为推行民主建政、建强根据地,边区党委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多种灵活方法开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针对由新四军控制的基本区,根据地充分发动群众,采取民选方式建立政权。这类基本区通常远离敌人统治的城市和县城,敌情威胁较小,区域范围相对稳定。经过较长时间的宣传动员,当地群众普遍拥护我党领导,积极支持新四军的抗战行动。在民选工作实施前,各基层党组织会派出工作

队,协助群众组建改选委员会,而后组织民众大会进行投票选举。选举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采用举手表决,有的在被选举人脚下插旗,有的在其身后的碗里投黄豆。无论形式如何,都真实体现了选民的意见。

二是针对有国民党旧政权的敌后地区,根据地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有利于人民的改造。尽管部分国民党地方政权及其武装力量从事反共活动,但在抗战大局下,仍有部分开明士绅或国民政府县、区长认同我党抗日主张,与附近新四军协同作战。对于此类政权,若单纯采取民选方式将其更换,可能造成局部统一战线破裂,适得其反。因此,边区党委采取更为温和的建政方式:帮助其完善民主机构,肃清辖区内匪患,建设自卫力量等。如此一来,不仅消除了他们对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威胁,更增强了团结抗战的力量。

三是针对伪军、顽军、新四军等多种力量共同存在的边缘区,根据地通过多种方式建立“白皮红心”的多面政权。这类地区通常敌情威胁较大,难以建立稳定的根据地,以往通过边区党委部分领导的个人关系进行争取,但效果有限且风险较高。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逐渐分散,其多次“扫荡”均被新四军粉碎,战略颓势日益显现。借此契机,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派出多支小型工作队或游击小组,在这些地区秘密建立农民救助会、妇女救助会等群众团体,将其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要媒介,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抓手。

鏖战侏儒山,战略围武汉

1941年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由李先念担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其主要任务是在鄂豫边区坚持抗日斗争。成立之初,该师下辖3个旅和2个游击纵

队,兵力达1.4万余人,在新四军各师中绝非弱旅。然而,该师活动于武汉四周,地跨5省边区,处于日蒋重兵对峙的险恶环境中,且长期远离师部、孤悬敌后,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为避免作战被动局面,第5师按照上级指示,采取“敌进我进”方针,分批次、分区域向敌后挺进建立根据地,最终逐步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第5师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大力向敌后发展。同年6月,该师以主力部队进入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直逼武汉市郊。该部采取各个击破、逐步拔据的战术,开辟了汉孝陂抗日游击根据地。

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武汉周围日军调动频繁,各据点兵力减弱。第5师决定乘机进一步作战略展开,开拓新局面。为造成战略包围武汉的态势,第5师决定首先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该区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的三角地带,物产丰富,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是武汉的西部屏障。但驻扎在此的日军并不多,主要依靠伪军守备。考虑到此地日伪据点稠密、易于相互增援,第5师决定采取“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首先集中力量重点打击其中1个敌人据点,尽量缩短战斗时长,不给敌军前来支援的机会。

12月7日,第5师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从汉阳肖家集、索河出发,分两路奔袭驻守侏儒山的伪第1师第3团团部。经过对伪军的争取,第15旅顺利通过敌军3道岗哨,直扑团部所在地,未发一枪即成功俘获该团部100余名官兵。战后,第5师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全部释放,此举对周边伪军产生强烈震动,此后不断有小股伪军主动投诚。在随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第5师连续发起多次攻势,几乎全歼伪第1师主力,并成功击退日军数次增援。侏儒山战役胜利后,川汉沔地区伪军士气彻底崩溃,纷纷向武汉方向溃逃。我军乘势控制汉阳、沔阳、汉川间大片地区,初步开辟川汉沔根据地,为第5师后续向襄西、襄南发展创造了前进阵地。

随后,第5师又先后开辟和恢复了赣北、襄西、襄南等多处根据地。至1943年9月,该师成功进入石首江北地区,并逐步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1944年10月,中共鄂豫边区工委称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委,并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5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成为党在华中敌后领导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到抗日战争胜利时,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到湖南洞庭湖的广大地区,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完成了收复失地、解放人民、直至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任务。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1931年7月1日,国民党军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国民党军会进行第三次“围剿”,但没料到国民党军在遭受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只隔了1个月,又发动新的“围剿”。因此,当敌人开始进攻时,红军尚未进行新的反“围剿”准备,正分散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且未得到充分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余人。

面对新的“围剿”,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命令分散在闽西广大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向苏区中部地区集中,待机破敌。7月28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完成回师集中任务。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高兴圩地区进行短期休整,进行反攻作战准备。7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接到红12军军部的报告,得悉敌军主力正向兴国方向疾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据此,红一方面军决心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以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当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地区时,发现敌军已抢先赶到富田。根据这一情况,红一方面军当即决定改变计划,令各部悄然折回高兴圩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随后几天,各路敌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西有赣江,南、北、东三面有敌9个师进逼,形势十分严重。各路敌军中,向良村、莲塘前进的敌第3路进击军2个师的战斗力较弱,易于歼击。红一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采取中间突破战法,由高兴圩地区向东突进,求歼向莲塘前进的敌第3路进击军,而后进击龙冈、黄陂,调动敌军于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8月5日晚,红一方面军第3、第4、第12军(欠第35师)、第3军团、第7军共2万余人,利用夜暗,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中,翻越崇山峻岭秘密东进,寻歼敌第3路进击军。

6日午前,方面军主力进至莲塘、官田地区,隐蔽待机。敌军对红军主力东进行动没有察觉,其第1、第2路进击军在红12军第35师、红35军和地方武装的牵引下,正向西直扑赣江边,寻红军主力决战,而其第3路进击军则由良村分两路向莲塘、城冈前进,态势比较孤立。这就为红一方面军主力歼击该敌带来有利条件。午后,敌第3路进击军第47师第2旅进到莲塘附近,红3

『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莲塘战斗

■黄军红 王高泽

军团警戒分队同敌接触。根据当面敌情,红一方面军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而后向北进击,求歼第3路进击军主力。具体部署是:以第4军、第3军团、第7军攻歼敌第2旅;以第3、第12军(欠第35师)为预备队。

当晚,红军第4军、第3军团、第7军秘密向敌接近。7日拂晓,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总攻击令。激战至9时,将敌第47师第2旅及由良村西出侦察的1个多营全部歼灭,击毙敌旅长,取得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到这次战斗时,感慨地说:“第三次反‘围剿’虽是这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的莲塘战斗旧址。

资料照片

补丁军装里的誓言

■马金平 马忠达

“红军财产,个人保管”,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名红军干部用生命践行的誓言。这8个字,就写在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锡龙军装的领口。1933年冬,张锡龙深入连队检查训练时,作训参谋注意到他的军装破旧不堪,手肘处棉絮外露,肩头补丁叠着补丁。参谋当即为他申请了一套新军装。

张锡龙得知后,不仅没有接受,反而立即退还新军装。当晚,他在煤油灯下铺开那套旧军装,取笔蘸墨,在领口内侧一笔一划写下“红军财产,个人保管”8个字。第二天在全师军人大会上,他指着军装说:“我们红军的每一份财产都属于革命事业,都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领导干部只有保管使用的权利,绝没有特权享用的资格!”

这番话很快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得到印证。1933年冬,张锡龙率部转战闽西山区。部队在严寒中艰难行军,朔风凛冽。警卫员见他只穿着单薄军装,悄悄找来一件缴获的棉大衣。张锡龙发现后厉声批评:“前线伤员比我们更需要保暖!”他当即命令将大衣送往野战医院,自己则蹲在田埂边,仔细地将稻草搓成细绳,一圈圈缠在军装里御寒。战士们看到这一幕深受感动,纷纷效仿,部队士气不降反升。

同年12月,张锡龙在指挥江西黎川团村战斗时,同黄克诚并肩在前阵地指挥,黄克诚的眼镜被敌人子弹

打掉,张锡龙不幸被击中太阳穴英勇牺牲,年仅27岁。硝烟散尽,战友们整理遗物时发现,这位红军师长除了身上那套打着补丁的军装和一双磨破的草鞋外,竟别无他物。军装的上衣磨出毛边,肘部与膝盖处都打着整齐的补丁,最引人注目的是领口内侧用毛笔工整写着的8个字,墨迹虽已斑驳,却依然清晰可见。张锡龙用生命践行了“红军财产,个人保管”的誓言,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廉洁自律。

这种廉洁自律的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种,在人民军队中代代相传。抗战时期,八路军第344旅炊事班班长徐海东身体多病、日渐消瘦,便用珍藏的白面给他煮了碗面条。徐海东发现战士们都在喝野菜糊糊,毫不犹豫地将军面条倒回大锅搅匀,重新盛了碗野菜糊糊,说:“我们八路军讲究官兵一致,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是旅长,更应该带头遵守这个规矩。”这番话让在场战士无不动容。

军装虽已褪色,但“公家财产分厘不私用”的信念历久弥新。真正的廉洁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坚守;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需要用终身去践行的信念追求。它在一套军装、一碗面条中具象为永恒的精神丰碑,照亮着一代代革命军人的前行之路。

“独撅子”是一种民间土法制造的手枪。该枪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打完后还要将握把向下掰开退出弹壳,再重复装弹,因此又名“撅把子”“独一撅”“独角牛”“单打一”等。其枪管多为自行打制,有的用铁条盘成;口径不一,可发射手枪弹或步枪弹,部分有膛线,多数为滑膛。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小型兵工厂甚至个人都能自制这种手枪。比如,鄂豫皖军委兵工厂鼎盛时,可日产“独撅子”4支,几年累计生产该枪3500余支,成为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的重要武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就陈列多件此类武器。

抗日战争时期,为满足抗日武装对枪支的需求,根据地大量制造这种“独撅子”,作为推广群众性游击战的重要武器,主要装备民兵和游击队。很多地方抗日武装,正是使用“独撅子”打击敌人,缴获武器,进而发展壮大。

此外,“独撅子”在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中也有少量使用。根据一份1943年1月4日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通知



八路军使用的“独撅子”。

资料照片



新四军使用的“独撅子”。

资料照片

军工部加制单响枪及其分配问题的记录,可以看出单响手枪(即“独撅子”)在1943年的使用量不小,一次就造了1000支,而且都是分配给主力部队使用。新四军各师兵工厂均能生产这种简易武器,仅新四军第5师兵工厂几年间就生产出1500支“独撅子”,且大部分供该师使用。

抗战中期,为粉碎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中共决定发展敌后武工队,插入敌人心脏。由于武工队多在敌后作战,经常要穿便服,还要和日伪军打照面,长枪因无法隐藏几乎不用,又

没有那么多驳壳枪,而“独撅子”可以轻松藏在身上,就成为武工队大量装备的主要武器。由于“独撅子”外观粗糙,使用时间一久,往往容易生锈,看起来就像一块破铁。因为这种武器实在不像枪,日军还因此吃过头。

据一名侵华日军回忆,1945年刚刚入伍的他几个新兵奉命在胶东周边村庄抢粮食,突然被打了冷枪,一人手臂中弹。他们四处搜索,抓到了一人,从他身上搜出一把掰开的“独撅子”。可是这几个日军新兵都不认识这种土法制造的手枪,就问:“这是什

么?”那人沉稳回答道:“这是做木匠的工具。”日本新兵看着这个粗糙不堪的铁块,没有想到这是枪,便扔还给他,背着抢来的粮食,扶着伤员走了。回到部队,向小队长一汇报,他们每个人都结结实实吃了一记耳光:“什么木匠工具,那个就是枪,你们这群蠢货,放跑了八路!”待他们追回去,那名八路军战士早已撤离。



链接历史